

新安医家汪昂医著的编写特点 及其对中医学普及的贡献

郜晓芹 卜菲菲 常先甫¹

(安徽中医药大学 人文与国际教育交流学院, 合肥 230038)

【摘要】:新安医家汪昂重视医学的教育与普及, 著辑的医籍大多从入门书着手; 凭借深厚的儒学功底, 编纂了多部中医学著作。文章探讨了其代表作《素问灵枢类纂约注》《医方集解》《本草备要》《汤头歌诀》的编写特色, 发现其医著体例新颖, 多有创见, 注释精当, 易学易懂, 对中医药学的普及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。

【关键词】: 注释 《内经》 方剂学 本草学

【中图分类号】: R22 **【文献标志码】**: A **【文章编号】**: 1008-3634(2019)06-0056-06

明清之际, 尤其是明中叶以后, 在万山环抱的古徽州——新安一带, 医学的发展呈现空前的繁荣景象, 其区域特色尤为突出, 成为徽文化的一个亮点。该地区自古即是文化之邦, 有着倡文化、重礼教、鼓励子孙走科举之路的传统, 习儒应举者众多。“学而优则仕”, “学而仁则医”^[1], 读书人如科举不售, 便转而研医。据《新安名医志》记载, 自宋至清新安地区共有医家及通医者近 800 人, 其中由士、儒而习医者占了 70%^[2]。庞大的儒医群体为新安医学的繁荣和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。他们饱受儒家思想教育, 潜心医学并用以解救黎民疾苦。歙县人程衍道敏而好学, 初为庠生, 渐为名儒, 后兼精医术, “活人甚众, 业擅一时。”^[3]休宁人程应旆, 一生精研《伤寒论》, 推崇仲景学说, 其弟子称其“大医必本于大儒。先生为海阳名硕, 髫年辄以冠军补博士弟子员……遭值申酉, 避地来吴, 乃去儒而医, 遂为大医。”^[4]

类似经历的, 还有程廷吁、程知、罗美、程林、程邦贤等, 均对后世医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汪昂也是属于这一类型的杰出人物。

一、汪昂生平概述

汪昂字切庵, 晚号洵湾老人, 明末清初徽州府休宁县人。关汪昂的一生, 史料记载甚少且混乱, 以致其生平事迹大多不详。据休宁县志记载, 汪昂为休宁县城西门人, “寄籍括苍”^[5]。括苍, 古县名, 唐大历十四年(779)改名丽水, 即今浙江丽水东南。汪昂的生卒年, 史料无确切记载, 后人只能参考其医著序言、凡例进行推测。根据汪昂本人在《增补本草备要叙》中所题“康熙甲戌岁阳月休宁八十老人切庵汪昂书于延禧堂”^[6], 大多认为其生年应为 1615 年(明万历四十三年)。其卒年, 由于目前也没有可靠史料支持, 多认为是 1694 年(清康熙三十三年)^[7]。

汪昂早年从儒, “为邑之秀才”, 熟谙经史百家。少年时即以古今文辞知名, 《休宁县志》称其文才突出, 仕途进取“易如拾芥”^[8]。清顺治初年, 正值盛年的汪昂弃儒从医。至于弃儒的原因, 《休宁县志》《重修安徽通志》、《中医中药史》等所载均不

基金项目: 安徽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中医药文化研究与传播中心重点项目(SK2016A0519)

作者简介: 郜晓芹(1964—), 女, 安徽濉溪人, 副教授, 硕士。

相同，或“弃举子业，好集医方”^[9]；或屡试不第，“罢制举，专意医学”^[10]或“家庭贫寒，弃举子业”^[10]或“弃儒经商……性喜医学，潜心研究”^[11]，也有认为其置明清换代之际，选择了誓不仕清^[12]……具体原因尚待考证。汪昂中年习医，此后大半生潜心医学，虽无系统的师传指导，但其叔父汪健侯为休宁名医，汪昂曾亲受其教诲；加之其禀赋异常，传统文化功底深厚，从医数年便声名藉藉。汪昂一生诊务繁碌，然其勤于笔耕，著书立说三十余载，至老不倦；深厚的儒学基础，其致力于医学理论的研究成果颇丰，有《医方集解》《本草备要》《素问灵枢类纂约注》（以下简称《素灵类纂》）、《汤头歌诀》《经络歌诀》《痘科宝镜全书》《本草易读》等医药学名著传世，在经典医籍整理注释、普及本草学及方剂学教育方面作出了突出的贡献。

二、分类注释《内经》，力求简明

汪昂早年开始学医时即认识到《内经》“理至渊深，包举弘博”^[12]，为医家所必读。然而又有感于其篇卷浩繁，文字古奥，纸缪实多，虽经历代医家整理、校注，但重点欠明，内容繁杂，“全书浩衍，又随问条答，不便观览，虽岐黄专家，尚望洋意沮”^[13]，于是仿照元代滑寿《读素问钞》之法，摘录《素问》《灵枢》主要内容并加以条析，依次分为脏象、经络、病机、脉要、诊候、运气、审治、生死、杂论等共9篇，参考历代注家注本进行了简要注释，编成《素问灵枢类纂约注》2卷，于康熙二十八年（1689）付梓刊行。

本书的突出特点，一是所选《内经》原文较为精要；二是分类简单，创新体裁，注释精辟。汪昂认为《素问》《灵枢》皆为经典，前者治兼诸法，后者偏重于针灸、经络，因此，分类整理了《内经》中的主要内容。在分类上，汪昂借鉴滑寿的方法，将《素问》有关内容分门编次，详加注释。与滑寿的十二类分法不同，汪昂分为九类。分类原则是以“适用而止”为主，“以类相从，用便观览”^[13]，注重经旨对临床的指导与应用。所辑原文以《素问》为主，所引原文均注明出处，以便查阅。对《内经》原篇虽有删节，但原段落依旧保留，前后内容仍然贯通，非割裂原文。经重新分类编次的经文更有系统性，首论脏腑、经络，再论病机、脉象，最后是运气、审治、生死、杂论，从分类次序上可以看出他对脏腑、经络、病机及脉象的重视。

在经文的分类上也显示了汪昂对某些理论的特别关注，例如对“运气”学说的重视，书中未列道生、阴阳、病能，而是将生死、运气分别列出，显示了以藏象、经络等为基础，以病机、脉要、运气等为主要内容的分类理念。关于此书的编纂，汪昂在该书序言中予以明确说明：“或节其繁芜，或辨其谬误，或畅其文义，或详其未悉，或置为阙疑。”^[13]由于注意精选《内经》原文且分类有序，阐发《内经》旨意词简义明，立论大多较为允当，因此在《内经》节注本中较有代表性。

(1) 训解字词，兼析篇旨汪昂善于利用其扎实的语言文字学知识注音、字义，阐释句义，归纳篇旨。也善于使用一些传统的训诂方法明假借。《素灵类纂·病机第三》：“陷脉为痿。”汪昂注：“漏也。音闾，亦音漏。”^{[13]44}《素灵类纂·病机第三》：“血外溢则衄血。”汪昂注：“鼻血。衄，女六切。”^{[13]49}《素灵类纂·病机第三》：“马注：惋当作挽。读为闷。”^{[13]47}前二例分别用直音法和反切法注音，兼释字义；第三例使用了训诂术语“读为”。“读为”又作“读曰”，为古代注音兼释义的用语，用以表示古书中的假借字，意思是改读为某字。段玉裁《周礼汉读考·序》：“读为、读曰者，易其字也，易之以音相近之字，故为变化之词。”^[14]所谓“易字”，即换用本字以释借字。例3中以“读曰”说明“挽”为“闷”的借字。

在训释字词的同时，还注意对文句及章旨进行阐释。例如对《素灵类纂·藏象第一》“壮火散气，少火生气”的注释，先解释了“壮火散气少火生气”的原因，再联系人身生理之特点，说明“人身赖此火以有生，亦因此火而致病”道理，接着引马蒔的观点进行了评议，提示应参考王冰之注，才能够正确理解经意。汪昂对所摘取分类的经文常常在开篇概述要义，以便读者准确地把握章旨。如《素灵类纂·诊候第五》篇首指出专列诊候一篇的原因，并且提示此篇皆出《素问》，所以文上不加标识。

(2) 阐释医理，由博返约从杨上善、王冰到张介宾等，历代注家均重视对医理的阐发。汪昂善用简练、形象的语言来解释医理和病机，由博返约。例如在《素灵类纂·病机第三》中，汪昂不仅阐释“五脏六腑皆令人咳”的病机，而且结合临床，引用马蒔对于朱东垣治疗“五脏六腑咳”的观点，列举出了治疗“五脏六腑咳”的各种方剂。又如《素灵类纂·病机第三》中“三阴三

²①参见吴坤修《重修安徽通志稿·方技》。

阳,五脏六腑皆受病,荣卫不行,五脏不通,则死矣”^{[13]81},汪注分三个层次:一是援引《内经》《伤寒论》内容作注;二是以“昂按”的形式,引用刘草窗之文进行辨析;三是提醒读者参考其《医方集解》中的相关论述。注文虽长,层次清晰,逻辑严密。

自《黄帝内经》问世以来,历来学者对中医学的运气学说的观点并不一致。杨上善《太素》、王冰注《素问》均对运气之学有过较系统的研究或相应的发挥。汪氏也十分重视《黄帝内经》阐述运气的篇章,其注文的特点,是紧扣生克关系这一要领,指出运气学说的要点是研究“参赞化育”,将运气之说与儒家经典相联,颇为独特且有见地。

《素灵类纂》重视对脏腑的论述和阐发,首先节选《素问》及《灵枢》中22篇有关藏象的经文,序列为“藏象第一”并加以注释阐发。汪昂对脏腑的研究颇有成效,如对于肺脏治节之功、肝脏升发之性、三焦功能及部位的认识、对命门的阐释等,颇多发明。例如《素灵类纂·藏象第一》:“肺者,相傅之官,治节出焉”。注曰:“分布阴阳,主行荣卫,如调元赞化,故曰相傅。风痺痿蹇之人,心欲动而手足不随者,以肺病而失其治节故也”^{[5]9}汪氏对肺为相傅的含义理解深刻,不仅从肺的生理功能阐释其义,且能举临床病证以证之,识见超越前人。

(3)以经注经,以儒释医《素问》《灵枢》是《内经》的姊妹篇,其义往往互见,汪昂撰写《素灵类纂》,多汇通《灵枢》《素问》而释之。例如《素灵类纂·经络第二》“太阳根起于至阴,结于命门”,注文引《灵枢》:“《灵枢》曰:目也,即睛明穴。”《素灵类纂·病机第三》“血并于下,气并于上,乱而善忘”^{[13]47},注文引《灵枢·大惑论》“上气不足,下气有余……久之不以时上,故善忘”^{[13]47};而《灵枢·大惑论》“人之善忘者何气使然”注文又引《素问·调经论》“血并于下,气并于上,乱而善忘”¹¹,并互释之。

《素灵类纂》中还注意以儒释医。新安医学的完善与发展,有一个重要因素即以儒人医,儒医相通,将儒学的方法、识见融入医学,使医学理论与儒家文化紧密结合。汪氏儒医出身,善于从儒学角度分析问题、阐发观点。《素灵类纂·病机第三》:“人之耳中鸣者,何气使然?”汪昂注云:“人夜卧之时,五官皆有有事,惟耳能听,岂非以宗脉所聚,故有所警觉也乎?又人在母腹中,仅一血脉,闻雷霆火爆之声,则惊而跳,此时五官未备,而闻性已与外物相通,故《楞严》二十五圆通,独重耳根。孔子亦言‘六十而耳顺’,则耳之异于诸官也明矣。”^{[13]74}援引佛典及孔子名言以助理解文意,浅显易明。书中以儒学思想诠释经文较多,如“医学之有《素问》《灵枢》,犹吾儒之有《六经》《语》《孟》也。”^{[13]1}“愚谓先王之制六经,凡以为民也。有诗书礼乐以正其德,复有刑政以防其淫……而礼乐刑政之用于是乎或穷。是以上古圣人作为医术用以斡旋气运,调剂群生。”^{[13]1}汪氏以他深厚的儒学功底和传统文化素养,积30余年心力撰成《素灵类纂》,文字浅显通达,义理简明易懂,在诸多注本中评价较高。

(4)博采众说,引文丰富《素灵类纂》注解经文,博采众说,广泛引用前人成果。据统计,书中共引用前人注文150余处,主要为王冰、滑寿、马蒔、吴崑、张志聪注本;其他如林亿、全元起、杨上善等注释《内经》的观点,集前人之长。对所引之注文均标明来源,体现了尊重前人、严谨认真的治学态度。《素灵类纂》所引文献种类繁多,既有《内经》《难经》《甲乙经》等经典医著,又包括《说文解字》《楞严经》等字书、宗教著作等,共引书籍10余种,引文丰富,上自汉唐下迄明清,历代名家名著均有收录。

(5)注中有校,校注结合《素灵类纂》也很重视对经文的校勘,常常校中有注,注中有校。《素灵类纂·病机第三》注文:“狗蒙,目狗物而蒙昧也。尤,过也。王注:狗,疾也。吴注,改狗为胸,未确。”^{[13]55}先解释“狗蒙”词义,又列王冰注文,再对吴注提出疑问,校注结合。《素灵类纂·运气第六》“身热骨痛”注文:“《玉机真脏论》作‘身热肤痛’。”^{[13]49}《素灵类纂·病机第三》“其不痛不仁者”,注:“《甲乙经》作‘不痛’。”^{[13]100}《素灵类纂·脉要第四》“浑浑革革至如涌泉”^{[13]114},注:“《脉经》作‘浑浑革革,至如涌泉’。”此三例分别应用了本校法、对校法、他校法。全书应用最多的是本校法、对校法,他校法相对较少。

纵观汪氏校注《灵》《素》之法,有继承、有批评、有补充、有发展,经过删繁、勘误、注音、释意,力求言简意赅,显明

经旨，故名“约注”，极具实用价值。《素灵类纂》刊行于清代康熙二十八年(1689)，自问世以来，历代均有翻刻。至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59年将其铅印发行，其间的木刻、石印、影印、铅印版本已达45种^[15]，为现存类编、摘译《内经》单行本版数之最。其撷取诸家精华，注释精当，条理清晰，易于学用，故当代著名中医学家、中医教育家任应秋先生评价其“在《素·灵》分类节注中，不失为善本”^[16]。

三、精心研究医药，专攻方书

(1) 著《医方集解》，切合实用医方书起于东汉张仲景的《伤寒杂病论》，其收方250余首。唐代孙思邈《千金药方》、王焘《外台秘要方》均载方6000余首。宋太医院所编《圣济总录》收方20000余首，明代朱橚等编撰的大型方书《普济方》已收方60000余首。收方越来越多，而注方者却很少。至宋人成无己《注解伤寒论》、明人吴鹤皋《医方考》始有解方。据《医方集解·凡例》，“成无己始将仲景之书，先释病情，次明药性，使观者知其绪端，渐得解会，其系惠后之心，可谓切至。“自成氏而后，历年数百，竟未有接踵而释方书者……及明兴，始有吴鹤皋之《医方考》，分病列方，词旨明爽，海内盛行。”^[17]汪氏有感于当时医者不通文词，方书繁多，阅读诚难。为了避免村间市井稍能诵《药性》便“辄尔悬壶，草菅人命”，他精研医学，专攻方书，希望可以引导医者由浅入深、由简及繁地学习。通过认真地分析研究，他感到前人分类法虽有一定的实用价值，但不利于医者掌握。于是汪昂本着由博返约、去芜存菁的精神，从浩瀚的医书、方书中精选出最常用、最有价值的方剂编辑成《医方集解》和《汤头歌诀》。

汪昂之前，历代方剂的分类不尽相同，有按病症、药物组合、科别而分的，也有按药物功效、治法、主方等来分的。汪昂则认为，受病有原因，治疗有规则，必须辨明病因病机，才能提高疗效。前人方书大多解方而不能说明受病之缘由，用药却未能详明药物之性味。“古今方书，至为繁多”，初学者“读方不得其解，治疗安所取裁”^[17]？甚至会导致拙劣的庸医误世殃人。汪昂认为应按方剂的功效进行编章分类，应将理、法、方、药贯穿起来，才能体现中医辨证论治的精髓。因此，于清康熙二十一年(1682年)编写了《医方集解》三卷。

《医方集解》共载方865首，分为正方和附方两种。计正方300余首，附方500余首，并根据其治法分为21类。全书在编法上一改过去按病证列方的惯例，代之以法统方。这21类，一类一法，以法统方。例如“补养之剂”下统六味地黄丸、人参固本丸、四君子汤等39方；“发表之剂”下收麻黄汤、大青龙汤、小青龙汤、人参败毒散等18方。每方分主治病症、药味组成、方义分析、附方加减等，方名之下同样，先标功效、主治，再结合证治病因进行分析；先析致病之由，再析用药之意，以功效示辨治之理，方解中又首次标出方剂归经，辨证论方。《医方集解》论方紧扣理、法、方、药，层层相应。如论《补养之剂》六味地黄丸，首先交待该方的主治症为“治肝肾不足，真阴亏损，精血枯竭，憔悴羸弱，腰痛足酸，自汗盗汗，水泛为痰……”^[17]，接着对主治各症的机理加以分析：“或谓肾气丸为补水之剂，以熟地大补精血故也。不知精血足则真阳自生……水中之火，乃为真阳，此剂水火兼补，不寒不燥，至平淡，至神奇也。”^[17]语言简明，通俗易懂。总之，在各方剂分类中，以正方为纲，后论附方。每章又以临床效用主方为纲，加减变通附方为目，以正带附，主次有序。汪氏开创的“以法统方”的综合分类法，从通俗易懂出发，提纲挈领，切合实用，为后世医家所推崇。现代中医药教学使用的《方剂学》教材，基本沿袭了《医方集解》的编写体例。

(2) 编《汤头歌诀》，便于诵读方剂的数量繁多，浩如烟海，且组成庞杂，因此对于方剂的学习和记忆一直困扰着初学者。汪氏在完成《医方集解》的著述后，很快便感到其卷帙浩繁，不便携带。为了“使行旅可以轻资，缓急得以应用”，“故特束为《歌诀》，附于本草之末”^[18]。

《汤头歌诀》刊于1694年，选录常用方剂300余首，编成202首方歌，分为补益、发表、攻里、涌吐等20类。作为一部形式新颖、便于记诵的歌诀类医方著作，《汤头歌诀》一经问世便受到了初学者的欢迎，流传甚广，风行海内三百余年而不衰。汪氏此编最大的特点，在于粗分门类，便于检索。全书将300余方分为20部分，类似《医方集解》。查找某病某汤，一目了然，十分便捷。

歌后加注是此书的创新和又一显著特色。这种编著法，是以韵文歌诀为主、散文注释为辅，歌词与注释相结合，注释补歌词之未备。方歌限于字、句的数量，有时难以概括尽方药的全部，方后稍加注文，可以补歌词未尽之意，推明古人制方的本义；也可以使用药者有所依据，服药者得以参稽。

此书的语言风格也很独特。全篇采用七言诗体，每首篇幅不长，但内容丰富，包含了方药名、适应证、药物剂量、剂型等必备的内容。而且歌不限方，方不限句。在继承古方汤头的基础上，突破了古歌一概四句一方的限律，六句、八句、十句的也很多见，个别的多达二十六句，如“妊娠六和汤”等。

《汤头歌诀》的韵律非常整齐，除汤名、药名因不能任意变化而受限外，其余完全依照沈约《诗韵》，既押平声韵，也押仄声韵，既有首句入韵者，也有首句不入韵者，也有少量交错押韵和重韵，总之用韵灵活，不拘一格，显示了整齐的韵律美。再加上每方都有简要的注释，更加通俗易懂，易学易记。

《汤头歌诀》很讲究修辞艺术，修辞手法的运用为略显枯燥的医方书增添了形象性、可读性。例如书中常常使用比喻、夸张或拟人修辞格。修辞可以使所描写的事物具体化、形象化。例如《羚羊角散》中用“回春”喻指药物疗效的神奇，非常形象；《软脚散》用“霜”比喻药物制成后的颜色和形态，十分贴切；《茵陈丸》《白虎汤》《苏子降气汤》均运用了拟人手法，将药物的配伍和相使作用描画得生动而富于情趣。

《汤头歌诀》由于构思新颖，执简驭繁，便于诵记，其编写艺术对后世影响很大。清代医学家陈修园仿此体裁撰写了多部方书，如《伤寒方歌括》、《长沙方歌括》、《金匱方歌括》、《时方歌括》等，广受欢迎。借助歌诀的体式可以便捷、有效地了解和掌握方剂的组成、功效、主治等。现代编写的高等中医药院校使用的方剂教材也都附有歌诀，这种歌括体裁成为学习方剂的有效手段。

四、潜心历代本草，尊古不泥

(1) 功效为主，创新体制汪昂 31 岁时弃儒从医，自学医理，加之其所处年代恰逢明末清初，战事纷繁，他深感医药学的简明实用甚为关键。本草学发展至明代已进入鼎盛时期，《本草品汇精要》《本草纲目》等大型本草学著作已先后问世。但是，其卷帙浩繁和广博精深往往使初学者望而却步。虽然已有《本草蒙荃》《药性歌赋》之类适合初学者的读本，但前者“文拘对偶，辞太繁”，后者韵律严格，均不利于普及。于是为了“发前贤未竟之旨，启后人方便之门”^[191]，汪昂博览群书，潜心研究历代本草，于清康熙二十年(1681)著成简明扼要的《本草备要》。他尤其推崇明代医药学家李时珍和缪希雍的学说，《本草备要》就主要取材于《本草纲目》和《神农本草经疏》。虽然取法前人，但能够尊古不泥，书中不乏己见，且多有创见。

《本草备要》体制较之前的本草学著作有创新。其编写的宗旨，是“主治之理，务令详明，取用之宜，期于确切”^[191]。《本草备要》全书共 8 卷 8 部，收药 478 味，另有附药 26 种，合计 504 种，附图 400 余幅。每卷卷首为药性总义，总论药物的性味、归经及炮制大要等；然后按自然属性将常用药物分为 8 部：草、木、果、谷菜、金石水土、禽兽、鳞介鱼虫、人等。每药首先辨其气味形色，再分功用、性味、主治、品种、形态、炮制等加以论述。药名之下首标功效，以“功用”统摄“主治”，突出了功效的核心地位。这种对中药功效专项的确立与分列，就中药学理论的发展而言是一次极大的创新和突破。

(2) 通俗简明，注重普及《本草备要》是汪昂采掇诸家学说编撰而成，博采众长，引文丰富，除引述历代名家精论、验方、秘方、验案外，还记录了一些有关药效的志怪传说、轶闻趣事、医药典故、药物使用宜忌等。引书包括各类中医药学经典著作以及文学、宗教书籍、字书及志怪、笔记小说等，增加了医药著作的趣味性、可读性。其书着眼普及，通俗简明，被称为“清代流传最广的普及性本草学著作”^[191]。作为医学入门书，问世之后颇受欢迎，广为流传。

《本草备要》作为普及性本草学著作，开创了先列功效、后列主治的编写体例，融药性、医理于一炉，对后世中医药学的

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汪昂采用字笺句释的编撰方法，对医药学专业术语、生僻字等逐一详解，对引用的医家与著作、常见病因、病机、治则等作出精要阐述，为普及医学知识做出了贡献。

《本草备要》与《医方集解》，体裁上均为创制，且其分类体例严谨，体现了汪氏注药释方“一以功效为重心”的学术思想。以功效为主论药释方的著述方式为后世医家所继承和尊奉，也开创了近现代方剂学编写体例之先河，被视为“中医基本分类法”。自此本草、方书体例为之一新，功效在中药学、方剂学中的核心地位正式确立。

五、结语

儒医出身的汪昂，由于有深厚的文化素养和一定的临床经验，且善于兼贯理论与实践，因此留下大量的医著，嘉惠后人。汪昂尤其重视医学的教育与普及，在学术上不仅注重继承，而且敢于创新，其著辑的医籍大多从入门书着手，改变了过去沿用的旧体例，汇集了前人的医药精华，且删繁就简，由博返约，使前贤著作中未阐述透彻的内容得以充实完善。汪昂著书立说的目的，是为了普及、推广医药学知识，而实际上又创见诸多，促进了医药学的完善与发展。他不仅在本草学、方剂学的普及与发展方面成果卓著，而且对历来医家必宗的《内经》也进行了校释和整理，其编撰的《素问灵枢类纂约注》注释精当，易学易懂，被后世学者用为《内经》的教科书。其一生著述丰富，涉猎广泛，成就斐然，被誉为清代著名医学科普及启蒙派的代表人物。

参考文献:

- [1]王键. 治校问学历程中的片段思考[M]//王键. 杏林耕耘文存, 合肥: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, 2016:515.
- [2]叶圣陶研究会. 中华传统文化研究与评论:第4辑[M]. 北京:人民教育出版社, 2011:13.
- [3]王键, 黄辉, 郑日新. 十大新安医家[J]. 中华中医药杂志, 2013,28(3):742.
- [4]李平, 楚更五. 伤寒论后条辨整理与研究[M]. 北京:中医古籍出版社, 2012(3):10.
- [5]万正中. 徽州人物志[M]. 合肥:黄山书社, 2008:696.
- [6]傅景华. 黄帝内经素问译注[M]. 北京: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, 2010:513.
- [7]高希言, 朱平生, 田力. 中医大辞典[M]. 太原: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, 2017:616.
- [8]田代华, 李怀芝. 汪昂与《医方集解》[J]. 山东中医药大学学报, 2005(3):217.
- [9]休宁县志编纂委员会. 休宁县志[M]. 合肥:安徽教育出版社, 1990:600.
- [10]谭波. 中医史上的那些人与事儿[M]. 北京: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, 2018:108.
- [11]魏子孝. 中医中药史[M]. 台北:文津出版社, 1994:314-315.
- [12]董正华. 中医历代名家学术研究丛书[M]. 北京:中国中医药出版社, 2017:4.

-
- [13]汪昂. 素问灵枢类纂约注[M]. 北京: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16.
- [14]刘乃和. 中国历史文选[M]. 北京:北京图书馆出版社, 1999:25.
- [15]甄仲. 汪昂对《黄帝内经》研究的贡献[J]. 江西中医学院学报, 2003, (2):18.
- [16]王永炎, 鲁兆麟, 任延革. 任应秋医学全集:卷二[M]. 北京: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, 2015:928.
- [17]汪昂. 医方集解[M]. 北京: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1997.
- [18]汪昂. 中医临床经典丛书·汤头歌诀[M]. 太原: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, 2018.
- [19]汪昂. 本草备要[M]. 北京:中国中医药出版社, 1998.